



# 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的影响

——来自 2010—2021 年 CGSS 数据的新证据

陆杰华<sup>1,2</sup>, 孙 杨<sup>2</sup>

(1.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2.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越来越成为建立婚姻关系的重要基础。当前普遍存在的初婚推迟现象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了持续挑战。既有以初婚年龄考察教育水平提升与婚姻推迟间关系的研究存在忽视教育发展客观性和必然性、计量模型内生性问题难以解决、无法解释教育对婚姻市场的实际影响等一系列问题,既没有为现代社会婚姻匹配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经验证据,也难以客观反映中国教育发展与婚配市场的实际状况,需要重新审视教育与婚姻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 2010—2021 年 5 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在实际初婚年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最高学历毕业时间作为观察时点,从“毕业-初婚间隔”维度探究高等教育带来的初婚自然推迟以外的社会经济净效应。研究发现:在剔除了上学的自然推迟之后,高等教育显著正向影响初婚风险,缩短毕业-初婚间隔,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上学的“禁闭效应”最终会转化为婚配市场中的社会经济优势效应、年龄追赶效应和同群社交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年轻人更快进入婚姻。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生相对于专科和本科毕业生具有更明显的婚配优势。相对于女性,高等教育对男性的初婚优势主要体现在专科和本科学历层次,但在研究生学历层次出现逆转。随着人口出生队列的推移,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层次的婚配优势减弱,研究生学历层次的婚配优势增强。受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深刻影响,高学历的婚配优势愈加凸显,逐渐抵消甚至扭转上学对初婚造成的自然推迟,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在约束力逐渐超越自然推迟效应,成为当代中国初婚年龄推迟的主要动因。研究表明单纯从初婚年龄角度推测教育与婚姻的关系无法估计出高等教育对初婚推迟形成的净影响,为解释中国社会经济语境下的婚配行为和婚姻市场状况提供了有力新证据和新理论视角。

**【关键词】**高等教育;初婚;婚姻市场;生存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志码】** 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25.02.001

**【文章编号】** 1004-129X(2025)02-0001-16

**【收稿日期】** 2024-10-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问题研究(22JJD840001)

**【作者简介】** 陆杰华(1960-),男,辽宁沈阳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孙杨(1997-),男,四川泸州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研究缘起

婚姻通常关联着家庭的建构与发展,是每个人生命历程中十分重要的事件和人生阶段,对推动人口再生产、社会再生产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有着特殊的意义。<sup>[1-2]</sup>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观念对婚姻家庭都非常重视,传统模式中的婚姻不仅只是夫妻之间的合法缔结,也关乎双方家族的传承延续。先成家而后立业才是更为被认同和接受的良俗价值,社会普遍奉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早婚与普婚传统。<sup>[3]</sup>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婚姻观念与行为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进入婚姻的年龄均明显推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1990—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2.9岁增加到28.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上升到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也从22.2岁提升到28.0岁。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给出了影响生育水平的多个因素,初婚初育年龄便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sup>[4]</sup>鉴于婚内生育仍占主流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初婚推迟直接导致生育行为延后、生育水平降低,对中国人口数量和质量长期均衡发展带来挑战。<sup>[5-6]</sup>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长期低生育率主导的人口减量发展趋势凸显的新形势下,关注婚龄人群初婚推迟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议题,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和重要的生命历程阶段在解释初婚推迟的理论框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sup>[7-9]</sup>人们普遍认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影响初婚年龄。<sup>[10-11]</sup>接受高等教育延后了婚龄人口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改变了生命历程进度,使初婚时间推迟。<sup>[12]</sup>现有文献似乎也已经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高等教育在客观上产生了冲击婚姻市场的“教育悖论”,具有显著的初婚推迟效应。<sup>[13-14]</sup>杨克文和李光勤认为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初婚年龄将会推迟0.11年。<sup>[15]</sup>朱州和赵国昌基于2010—2015年CGSS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多接受1年高等教育,平均初婚年龄将延后1.5年。<sup>[16]</sup>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结婚成本和社会经济压力越来越高,高等教育能够带来的经济优势和发展潜力在婚姻市场中的有利地位愈发增强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高等教育提高了婚姻进入的可能性,而既有分析教育与婚姻形成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这一现实问题。

在人口婚育转变与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新形势下,有必要重新探讨高等教育与婚姻推迟间的关系,明晰高等教育发展对我国初婚推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此,本研究将基于2010—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在实际初婚年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最高学历毕业时间作为观察时点,从“毕业—初婚间隔”维度来衡量婚姻事件的发生概率,考察高等教育带来的初婚自然推迟效应以外的社会经济净效应。旨在尝试为重新审视教育与婚姻的关系提供新理论视角,为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境下的人口婚育行为转变提供新经验证据,不仅有助于解释当代婚姻模式转型乃至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中的人口新特征新现象,还对进一步完善婚育支持政策、促进适龄婚育和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二、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1. 文献回顾与评述

大部分探讨教育与婚姻行为关系的经典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高等教育会显著推迟初婚年龄。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在客观上产生的所谓“禁闭效应”,<sup>[17]</sup>进而带来初婚的自然推迟。不管是教育还是婚姻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需要足够的经济支撑。而上学导致上述必备条件



和社会角色受到限制,个人作为学生身份的在校时间延长,经济上也只能依靠父母支持,待学业完成之后再考虑结婚才是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进入婚姻的时间被不断推后。<sup>[8][11][13]</sup>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还极有可能意味着个人婚姻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当前中国“80后”“90后”甚至“00后”普遍有着较强的自由独立思想,晚婚乃至不婚趋势正在逐渐消解着传统的婚姻行为观念及模式,一些人不再将结婚作为完整人生的必选项,<sup>[18]</sup>这也是导致初婚推迟的一个重要方面。

传统家庭经济理论认为每个人的劳动力投入都在家庭与市场两部门间的理性竞争与配置中追求效用最大化。<sup>[7]</sup>受教育程度提升促进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无疑会提高个体在工作中的经济收益,反过来选择婚姻家庭的预期效用减少,还会增加因结婚而在工资收入、职业发展、工作技能等方面产生的机会成本,<sup>[19]</sup>导致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推迟结婚时间。当然,这种现象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性别专业化分工理论进一步提出一个家庭中男性和女性分别在市场劳动与家庭事务上具有相对优势,以此按性别角色进行的专业化劳动分工能使夫妻双方的效用达到最大化。<sup>[20-21]</sup>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有了更强的竞争力,有更多时间和机会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经济上也不再依赖于丈夫的支持,从而能够逐渐摆脱传统家庭角色分工的束缚。因此相比于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更可能偏好推迟进入婚姻。从传统文化观念看,中国家庭同样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导致高等教育对女性婚姻推迟的影响要大于男性。<sup>[6][22]</sup>高等教育还会增加婚姻的搜寻时间和匹配难度,导致初婚时间推迟。<sup>[23]</sup>个体在教育水平提升的同时,进入婚姻市场的年龄梯度和教育等级也在不断提高,而教育层次越高的群体人口规模越小,这使择偶的可选范围缩小,找到适配对象的难度增加。特别对于女性群体而言,受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长期影响,我国一直有着社会经济地位上“男高女低”、年龄上“男大女小”的差异化婚配秩序。高学历女性往往受到年龄和教育层次的双重婚配挤压,<sup>[24-25]</sup>在择偶市场更容易处于不利地位,初婚推迟现象更为显著。

也有部分研究和理论提出高等教育会促进婚龄人群进入婚姻。Oppenheimer的职业进入理论特别强调现代社会中男女两性都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随着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高等教育带来的经济潜力优势和职业发展前景逐渐取代传统的外表、个性和家庭背景,越来越成为婚配市场的重要评价标准。<sup>[26-27]</sup>对于男性而言,高等教育奠定了婚姻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潜力,一直以来都对促进更早结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Blossfeld等、Ono也认为只有在性别角色严重分化的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才会与女性的结婚风险呈负相关。<sup>[28-29]</sup>而在现代社会,男女两性不再被传统工作和家庭角色分工限制,高等教育带来的经济资源能够显著让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促进婚姻进入。从婚姻回报的角度,高等教育的婚配优势还体现在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比如对下一代学业表现和健康发展的积极影响。<sup>[30-31]</sup>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转变,中国的婚姻匹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越来越趋向教育的经济优势假说。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压力不断上升,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在婚姻市场中更具竞争力,使高等教育对婚姻进入的正向作用愈发明显。<sup>[32-33]</sup>刘伯凡和刘叶还从结婚率角度证实了该理论在中国婚姻市场的适用性,认为高等教育只是推迟人们进入婚姻的时间,并不意味着导致不结婚,而反过来会让个体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更为明显,从而提高婚配效率和结婚率。<sup>[34]</sup>

综合来看,在影响婚姻形成的社会经济因素不断增多的复杂情境下,高等教育到底会在其中产生怎样的效应及作用机制并最终是否导致婚姻推迟,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论。不过,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可以发现既有关于高等教育如何推迟初婚的研究主要基于对实际初婚年龄

的考察,这可能存在以下三个方面明显的局限:

第一,就教育本身而言,一方面,教育对于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获得更高水平教育不仅是人类不懈追求的发展目标,也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在考虑在校学生身份与丈夫或妻子角色不兼容的情况下,接受高等教育使人们真正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整体发生了延后,从而改变了初婚风险发生队列的人口年龄构成。按照小学入学年龄为6岁计算,以16~35岁高峰初婚风险发生年龄段为例,2000—2020年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1年增加到12.1年<sup>①</sup>,适婚队列的初婚风险实际发生起点从15.1岁变为18.1岁,人口年龄结构整体往后推移了3年,这必然导致初婚年龄的推迟。再以中国的学制为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年龄分别普遍在21岁、22岁和25岁之后,这才是相应队列进入婚姻市场并发生初婚风险的实际年龄基线。上述两个方面意味着高等教育对初婚推迟的影响既存在客观性,即教育本身的发展不是问题,也有其必然性,即从发展的视角看,由教育提升造成的平均初婚年龄推后或许也是随经济社会不断进步而会发生的历史必然,仍以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历史条件下普遍早婚的传统视角看待现代社会初婚模式转变似乎不合时宜。而囿于初婚年龄则可能会高估高等教育的初婚推迟效应以及中国在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初婚整体推迟趋势,从而形成对初婚推迟现象的过度焦虑。

第二,从现实层面来说,由于婚姻普遍发生在教育完成之后,接受高等教育对初婚的影响实际上是在结束教育后真正进入婚姻市场直至结婚的一段时间,而非包含了学前期、上学期和择偶期多阶段生命历程。初婚年龄中的前两个时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对固定的,以实际初婚年龄作为结果变量更多体现的是受教育年限带来的自然推迟,无法解释高等教育对婚姻市场的实际影响。再从近年来我国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和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动趋势看(见图1),二者呈现出明显的异步化变动特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快速增长始于1999年高校扩招,而平均初婚年龄在2010年之前一直稳定在24岁左右,近10年来才迅速增加到28.7岁。就影响的程度上看,即使理论上新进婚龄队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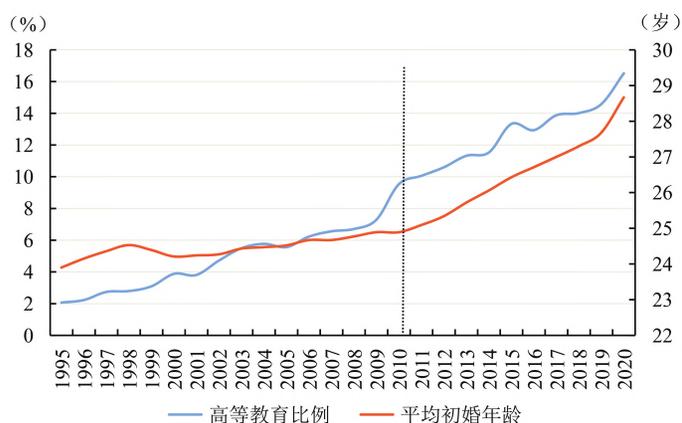


图1 1995—2020年我国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和平均初婚年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上册)》和1996—2020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绘制。

人口受高等教育比例达到100%,其进入婚姻市场的实际年龄也远低于且不足以解释当前持续走高的初婚年龄。因此,从单纯的初婚年龄角度考察教育与初婚之间的关系不仅难以估计高等教育对初婚推迟的净效应,而且无法区分甚至低估或排除到底是高等教育改变了初婚风险新进队列的人口结构,还是改变了婚龄人群的偏好、观念和行为模式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在约束力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初婚推迟态势的实际影响。

第三,在估计方法上,实际初婚年龄已经将接受教育这一阶段时间历程包含

① 根据2000—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在内,尤其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婚龄人口来说,上学经历几乎构成了生命前期的绝大部分。以初婚年龄作为结果变量考察高等教育对初婚的影响,其内生性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导致高等教育对初婚推迟作用的大小及方向可能出现偏差。

持促进论的学者主要立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婚姻市场和就业市场变化,重点关注高等教育引致的外在社会经济效应对初婚进入的潜在影响,但这部分研究多限于理论演绎和框架分析,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目前从“毕业-初婚间隔”角度考察教育引致自然婚姻推迟以外的社会经济净效应的实证研究还比较鲜有。尽管国外有少量研究尝试过剔除受教育带来的结婚时间自然推迟,从而更清楚地讨论个体进入婚姻市场后教育及其他因素对初婚的影响,但仍未得出一致性结论,<sup>[35-36]</sup>既没有为现代社会婚姻匹配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经验证据,也难以客观反映中国教育发展与婚配市场的实际状况。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拟以教育完成时间为初婚风险发生起点重新探讨高等教育与婚姻形成的关系,以期对以往研究作出一些更新与补充,并试图为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婚姻实践转变提供更加明晰的本土化解释。

## 2. 研究假设

根据中国婚配市场的现实情境,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结婚成本和社会经济压力越来越高,高学历愈发成为择偶的重要标准。高等教育很大程度能够带来更好的就业表现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可能实现婚姻承诺,有利于提升夫妻生活品质与子女教育质量。<sup>[27][30][32]</sup>这些社会经济优势对于现代社会的婚姻缔结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在婚姻市场上有着更强的竞争力。尽管从实际结婚的年龄看,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结婚时间会更晚。但在这个高等教育趋向普及化发展和更加看重择偶双方社会经济条件的年代,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长期投资优势,会逐渐消除甚至扭转学业时间上的自然推迟作用。

除此以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市场中年轻人择偶配对的教育同质性趋势增强,在高学历人群中尤为明显,这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大大增加了结识同等学力层次异性的机会,使婚姻匹配的难度更低,结婚可能性提高。<sup>[10]</sup>个体生命历程中年龄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符号,接受高等教育还意味着自身婚育年龄的增长,加之中国父母普遍存在的催婚习惯,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毕业之后可能加快结婚进度,甚至降低择偶标准以减少婚姻搜寻的时间和难度。据此,本研究的基本假设为:

假设1:在剔除了上学带来的自然推迟之后,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毕业-初婚间隔时间显著更短。

如前所述,在婚姻市场中,与受教育水平相关联的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择偶婚配的关键。<sup>[27][33]</sup>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三个学历层次,拥有不同学历层次在文化观念、经济潜力、职业前景等各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婚姻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内部不同学历层次对初婚进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国传统的性别关系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性别平等意识觉醒,尤其是女性在社会、家庭、个人等各个领域的平等权利和独立性显著增强。然而,受传统性别分工和家庭观念的长期影响,当前社会男女两性在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还存在某些现实差异化挑战。一方面,即使是在同等教育水平下,男性更可能在工作场域取得成功,其就业状况往往优于女性。<sup>[37]</sup>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在婚姻家庭领域,相比于女性,男

性群体身上仍有着更高的角色期待,需要承担主要的结婚成本和家庭经济责任。<sup>[3][22]</sup>从这两个方面考虑,在婚姻市场中,高等教育对于男性择偶及婚姻进入更加重要。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高等教育对不同特征群体初婚进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高等教育对男性群体初婚进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生于不同时代的群体结婚所要面对的客观社会条件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导致对婚姻的客观物质条件有了更高的追求。<sup>[33]</sup>特别是住房制度经历了从平均分配到市场化的变革,对婚姻的影响最为明显。商品房时代,不断攀升的房价大大增加了结婚难度,成为男女双方婚姻抉择的主要考量。<sup>[32][38]</sup>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大幅增加,客观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竞争,<sup>[15]</sup>高等教育的就业优势随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变动而不断发生变化,这自然也会影响婚姻市场上的择偶竞争力。因此,本研究作如下假设:

假设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对于不同时代出生队列的居民初婚进入的影响不同。

为检验上述假设,并重新探讨教育水平提升与初婚推迟间的内在联系,本研究将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利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描绘实际初婚年龄和毕业-初婚间隔两种不同测量方式下的初婚风险曲线,初步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下初婚风险的变动趋势和特征。其次,从毕业-初婚间隔角度出发,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影响初婚进入的潜在差异,为深入审视与理解当代人口婚姻行为转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最后,从性别、学历层次、出生队列等角度出发,探究高等教育对不同群体初婚进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为解决复杂社会经济情境中的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等社会治理与人口公共难题提供实证参考。

### 三、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 1. 模型构建

本研究主要探究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的影响,初婚风险的发生实际上是一个历时事件。在截面数据中会有观测样本在观察时点没有结婚,并且在未来何时结婚也不确定,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分数据“右删失”的问题。生存分析中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基准风险函数的形状没有限制,模型假定也比一般参数估计模型更加宽松,能够在不删除截尾数据的条件下分析影响风险发生及持续时间的各种因素。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将采用适用性较广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的影响,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h_i(t, x) = h_0(t) \exp(\beta_1 education_i + \beta_2 x_{i2} + \dots + \beta_k x_{ik}) \quad (1)$$

$h_i(t, x)$ 表示个体*i*在历险时间为*t*时的初婚风险函数,本研究中的历险时间具体指从个体毕业时点算起的未婚持续时间,以毕业至初婚发生或调查截止日期的时间计算,单位用“年”表示。 $h_0(t)$ 表示全部解释变量都取值为0或者标准状态下的基准风险函数。 $\exp(\beta_1 education_i + \beta_2 x_{i2} + \dots + \beta_k x_{ik})$ 为以实数*e*为底的指数函数。 $education_i$ 为本研究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赋值为0,接受过高等教育赋值为1), $x_{i2} \dots x_{ik}$ 为控制变量,分别通过回归系数 $\beta_1, \beta_2 \dots \beta_k$ 来解释其影响的方向和大小。



##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包括2010年、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21年共5期混合截面数据。CGSS项目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调查项目,调查范围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CGSS数据库全面地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包含个人婚姻、教育、就业、家庭等方面的详细信息,能够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

本研究根据分析策略和研究模型的需要,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研究对象为婚龄人群,参考以往文献和中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将样本的年龄范围限定在15~50岁之间;本研究主要考察高等教育对学业完成后进入婚姻市场直至初婚发生这一段时间经历的影响,因此仅保留已获得最高学历且最高受教育程度处于毕业状态的非在读居民样本;剔除其他初婚经历和教育经历等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或异常值的无效样本。此外,尽管大多数样本都选择在学业完成之后再结婚,即最高学历获得时间在初婚发生之前,但仍不排除在上学期期间结婚或结婚后再提高学历的情况,这部分样本不符合研究目的,还可能会对统计模型造成干扰,故将其排除(占每期清洗后样本的6%左右)。最终得到14 938个有效分析样本。

## 3. 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初婚风险,包括初婚状态和毕业-初婚间隔,以表征个体完成学业后进入婚姻市场直到初婚的这一段期间,目的是剔除上学的自然时间延后对初婚推迟造成的内生影响,从而考察教育导致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初婚进入的净效应。CGSS数据详细记录了“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您已完成的最高学历是在哪一年获得的?”“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您第一次结婚的时间是?”等信息。初婚状态中已经历初婚风险定义为“1”,未发生初婚风险的未婚样本定义为“0”。毕业-初婚间隔由初婚年份与最高学历完成年份相减得出,对于在调查时期未发生初婚事件的样本,则以调查年份为止的持续时间来定义毕业-初婚间隔。考虑中国的学制,通常每年的6月份为毕业季,因此还需要将初婚年与毕业年的差值分别加上1后纳入分析模型,以避免毕业后当年结婚使二者差值出现0的情况。此外,为刻画不同测量方式下高等教育对初婚的差异性结果,本研究还在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实际初婚年龄作为比较,通过初婚年份与出生年份的差值获得。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设置为二分类变量。参照组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等)赋值为0,实验组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赋值为1。

为了排除其他因素对初婚风险的竞争性解释,笔者参考陈滔、杨克文和李光勤、朱州和赵国昌的研究成果,<sup>[14-16]</sup>选取个人的个体特征变量、社会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来看,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和年龄(接受调查时的实际年龄);社会特征变量包括政治面貌(党员为1,非党员为0)和户口类型(非农业户口为1,农业户口为0);家庭特征变量包括父辈受教育年限(父母中最高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为1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为15年、本科为16年、硕士为19年、博士为22年)和父辈政治面貌(父母至少一方是否为党员,党员为1,非党员为0)。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在有效分析样本中,已经发生过初婚风险的受访者比例为77.741%,平均在学业完成之后的6.547年进入婚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占比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样本特征

变量	均值/百分比
初婚状态(初婚=1)	77.741
毕业-初婚间隔	6.547
初婚年龄	24.645
高等教育(是=1)	32.929
性别(男性=1)	50.442
年龄	35.082
出生队列	
1960—1969	18.430
1970—1979	31.457
1980—1989	33.592
1990年及以后	16.521
政治面貌(党员=1)	10.758
户口类型(非农业户口=1)	54.057
父辈受教育年限	7.883
父辈政治面貌(党员=1)	19.126
数据时期	
2010	25.519
2013	24.019
2015	17.700
2017	20.839
2021	11.923

32.929%,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有近七成婚龄人口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5.082岁,性别比例较为均衡,约54.1%的受访者拥有非农业户口。父辈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83年,比子女受教育水平明显更低,而具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比例(19.126%)则略高于受访者一代的比例(10.758%)。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1. 初婚进入的生存曲线分析

笔者首先绘制全样本初婚进入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直观展示不同受教育程度下初婚风险的差异和变化特征,如图2和图3所示。按实际初婚年龄计算的初婚风险曲线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初婚生存曲线呈明显的梯度差异(见图2)。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风险概率越低,初婚的实际年龄越晚,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sup>[13]</sup>

然而,按毕业-初婚间隔计算的初婚风险曲线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风险概率越高,生存曲线下下降更快(见图3)。也即在完成学业真正进入婚姻市场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反而结婚越快。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婚姻市场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三者间初婚风险的差异要小于按实际初婚年龄计算的初婚风险。高等教育与高中及以下的初婚风险存在明显差异,但在毕业后10年左右差距逐渐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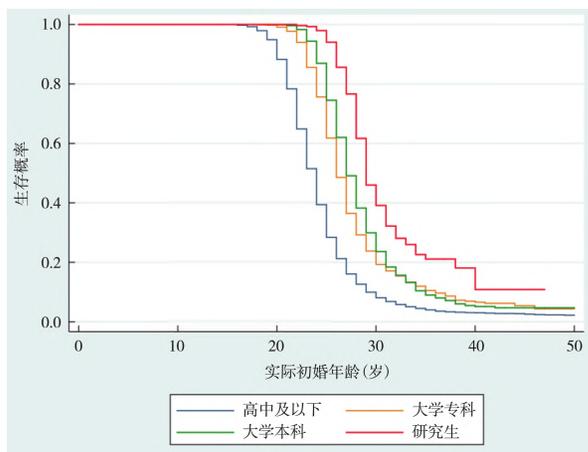


图2 按实际初婚年龄计算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初婚风险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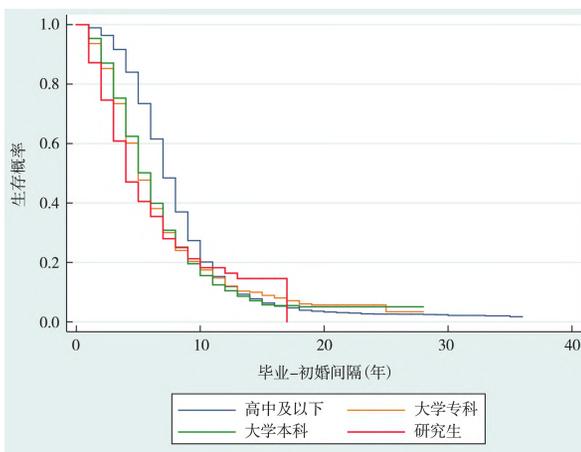


图3 按毕业-初婚间隔计算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初婚风险曲线



基于不同测量方式的初婚风险曲线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影响,更进一步说明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重新讨论教育水平提升与婚姻推迟间关系的必要性。

## 2. Cox 比例风险模型拟合结果

高等教育影响初婚进入的 Cox 比例风险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2 所示。从模型(1)到模型(4)可以看出在依次加入个人的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样本调查年份等控制变量后,高等教育对初婚风险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在完成学业进入婚姻市场之后发生初婚的概率,要显著高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也即高等教育显著缩短了毕业-初婚间隔,促进更快进入婚姻,本研究的基本假设得到验证。与此同时,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拟合系数均有所增大,意味着忽视个体和家庭差异会低估高等教育的婚配优势。

表 2 Cox 比例风险模型估计结果(N=14 938)

变量	毕业-初婚间隔				初婚年龄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高等教育	0.427*** (0.021)	0.527*** (0.025)	0.498*** (0.023)	0.560*** (0.026)	-0.809*** (0.021)	-0.562*** (0.025)
性别		-0.407*** (0.019)		-0.409*** (0.019)		-0.480*** (0.019)
年龄		0.013*** (0.001)		0.011*** (0.001)		0.017*** (0.001)
政治面貌		0.328*** (0.031)		0.325*** (0.031)		0.159*** (0.031)
户口类型		-0.206*** (0.021)		-0.184*** (0.021)		-0.383*** (0.021)
父辈受教育年限			-0.074*** (0.009)	-0.048*** (0.009)		0.070*** (0.009)
父辈政治面貌			0.092*** (0.025)	0.053*** (0.025)		0.037 (0.025)
2013 年数据	-0.085*** (0.026)	-0.082*** (0.026)	-0.077*** (0.026)	-0.076*** (0.026)	-0.073*** (0.026)	-0.078*** (0.026)
2015 年数据	-0.124*** (0.029)	-0.138*** (0.029)	-0.113*** (0.029)	-0.131*** (0.029)	-0.130*** (0.029)	-0.164*** (0.029)
2017 年数据	-0.130*** (0.027)	-0.139*** (0.028)	-0.112*** (0.028)	-0.127*** (0.028)	-0.152*** (0.027)	-0.172*** (0.028)
2021 年数据	-0.253*** (0.034)	-0.295*** (0.034)	-0.234*** (0.034)	-0.281*** (0.034)	-0.270*** (0.034)	-0.350*** (0.034)

注:表中报告的是拟合模型的回归系数及其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在以实际初婚年龄为测量标准的初婚风险模型(5)和模型(6)中,高等教育的拟合结果显著为负向,表示接受高等教育会使初婚的发生概率约变为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57%( $=e^{-0.562}$ ),即初婚风险发生概率下降43%左右,表明教育会带来显著的婚姻推迟效应,这与杨克文和李光勤、朱州和赵国昌等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sup>[15-16]</sup>

控制变量的拟合结果显示:以模型(4)为例,在完全进入婚姻市场后,女性发生初婚风险的概率要比男性高34%左右;初婚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显著升高;与非党员相比,政治面貌为党员的初婚风险显著更高;与农业户口的个体相比,非农业户口的个体初婚发生概率显著低16.8%;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初婚风险发生概率越低;拥有党员身份的父母,其子女初婚概率显著更高。这些结果与既往研究结论一致,初婚进入会受到个体特征、社会因素和家庭特征等综合因素的复杂影响。<sup>[11][13]</sup>从观测时期的影响看,相对于2010年基期年份,初婚发生概率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显著降低,这也印证了近些年来不断增强的初婚推迟态势。<sup>[22]</sup>除此之外,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出在考虑婚姻市场净效应的前提下,上学自然推迟以外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初婚推迟造成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

两组模型拟合结果的差异对比意味着在剔除了上学带来的自然时间推迟效应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初婚发生概率显著更高,可能会更快进入婚姻,而非教育提升导致初婚的完全推迟。其原因与实践逻辑可能有以下三点:

首先,从教育回报的角度,高等教育会带来显著的社会经济优势效应。与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更有可能获得更稳定的工作、更可观的收入以及更高的社会地位评价,有着明显的社会经济优势和未来发展潜力。<sup>[39-40]</sup>在中国社会婚姻观念和消费模式的当代变迁下,从结婚的老“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到新“三大件”(房子、车子、票子),人们对婚姻的物质基础有了更高的要求,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条件越来越成为择偶婚配市场中的重要评判标准,<sup>[32-33]</sup>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在婚姻市场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会更快地进入婚姻。这也印证了Oppenheimer提出的婚姻寻找理论以及教育带来的婚配经济优势假说。<sup>[26-27]</sup>

其次,从结婚率的角度,中国的文化观念一直以来都有着结婚传统,尽管当前年轻人的结婚年龄在不断推迟,但并不意味着终身不婚,普婚仍是中国人人口婚姻的一个突出特点,终身不婚率依然很低。<sup>[41]</sup>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接受高等教育与否,每个人终将陆续进入婚姻。模型(4)也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初婚风险显著提高。在结婚传统的牵引与催促作用下,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着急结婚相比,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通常毕业年龄就大,通俗上讲“正所谓三十而立,都老大不小了,该抓紧时间成个家了”,加上高等教育带来的经济优势也给予了一定条件,会更快也更急于进入婚姻,<sup>[42-43]</sup>这体现为高等教育导致的年龄追赶效应。笔者还对此进行了一定验证,拟合了获得最高学历的毕业年龄也即正式进入婚姻市场时的年龄对初婚风险的影响(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在表格中具体展示)。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毕业年龄每增加1岁,初婚发生概率就会显著增加11.9%( $=e^{0.113}$ )。因此,这一群体接受高等教育后很快结婚的现象往往被实际初婚年龄遮蔽,他们虽然毕业年龄晚,但真正进入婚姻市场后反而会加快结婚进程,形成不同幅度的追赶效应。

最后,从婚姻搜寻的角度,接受高等教育还可能产生积极的同群社交效应,降低婚姻搜寻难度,促进婚姻进入。出于上学对结婚造成客观“禁闭效应”的考虑,统计模型通常将其量化为固定的时间阶段。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接受高等教育并不意味着像关禁闭一样完全被学校限制。大学青年正值青春年华,恋爱交友愈发自由化、普遍化、公开化,只是鉴于学生与家庭身份的不兼容而没有正式结婚,多数情侣在学业完成后便会选择很快进入婚姻。<sup>[44-45]</sup>大学也是由学生向成人的过渡时期,学生与社会多重角色共同发生作用,逐渐积累的社交网络和人际资源可能对婚姻匹配产生积极影



响。<sup>[46-49]</sup>尤其是在以教育同质匹配为主导婚配模式的中国婚姻市场中，<sup>[50]</sup>相对于没有上大学而直接进入相亲市场，上大学产生的同群社交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婚姻搜寻的难度和时间，从而更容易找到合适的配偶并更快进入婚姻。

### 3. 稳健性检验

Cox 比例风险模型属于半参数模型，主要应用于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的估计，对基准风险  $h_0(t)$  的分布假设也较参数模型更为宽松，在处理大量生存时间相同的样本数据或者不满足等比例风险假定的变量时可能存在拟合偏误。基于此，笔者还将采用单参数指数回归模型、威布尔回归模型、冈珀茨回归模型等几种常用的参数生存分析模型对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sup>[51]</sup>分别如表 3 中模型(7)至模型(9)所示。由检验模型结果可知：尽管由于各参数回归模型对研究样本的生存时间的具体分布特征有一定要求，不同生存分析模型拟合出来的结果大小可能存在些许差异，但结果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均与 Cox 比例风险模型拟合结果保持一致，均显示高等教育显著正向影响初婚风险，缩短毕业-初婚间隔，说明上述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 3 初婚风险稳健性检验(N=14 938)

变量	模型(7) 指数回归	模型(8) 威布尔回归	模型(9) 冈珀茨回归
高等教育	0.317*** (0.026)	0.608*** (0.026)	0.484*** (0.02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 4. 异质性分析

婚姻是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矛盾统一，会受到社会、经济、家庭和文化等复杂因素的强烈影响。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转型的宏观背景下，由于文化观念、角色分工、价值期待、结婚成本、经济条件等的不同，男女两性、不同学历层次和代际间婚姻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特征，接受高等教育所起的促进作用可能存在一定差别。因此，为进一步分析不同人群中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影响的具体差异，笔者将从性别、学历层次和出生队列等角度考察接受高等教育对不同群体初婚进入风险的异质性效应(见表 4)。

表 4 分性别、学历层次、出生队列的初婚风险异质性分析

变量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女性	男性	“60”后	“70”后	“80”后	“90”后
专科	0.494*** (0.042)	0.579*** (0.046)	0.719*** (0.079)	0.487*** (0.050)	0.481*** (0.051)	0.327*** (0.118)
本科	0.537*** (0.049)	0.623*** (0.046)	0.851*** (0.091)	0.510*** (0.055)	0.531*** (0.053)	0.347*** (0.134)
研究生	0.928*** (0.127)	0.791*** (0.114)	0.548* (0.282)	0.725*** (0.154)	0.855*** (0.119)	1.147*** (0.3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 403	7 535	2 753	4 699	5 018	2 468

分学历层次和性别样本的初婚风险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尽管接受高等教育都能给男女两性带来显著的初婚优势，但不同学历层次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婚姻市场中，拥有专科与本科学龄人群的

优势差异不大,研究生学历相对于前两者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从性别异质性上看,相对于女性,高等教育对男性的初婚优势在专科和本科层次体现更明显。尽管教育同质婚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女性的教育背景也在逐渐成为重要的择偶标准。但是,当代中国的婚姻实践仍受到传统家庭婚姻模式中性别差异化期待的深刻影响。<sup>[52]</sup>与女性相比,男性通常承担着更多的成家立业责任期待,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对男性群体婚姻进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具有更大的初婚优势,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往往在婚姻市场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但这种情况在研究生学历层次出现逆转,表现为女性的初婚风险更高。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速度迅速增长,男女两性的教育差距缩小,高学历女性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家庭禀赋逐渐成为就业市场和婚姻市场中的竞争优势。<sup>[53]</sup>另一方面,传统思想观念也在伴随教育层次提升而转变,同时上学对婚育年龄的挤压效应促使女性比男性更可能降低择偶标准,<sup>[54]</sup>由此产生高学历同质婚和女性向下婚并存的社会新现象。<sup>[55]</sup>因此,在研究生群体中,高等教育对女性的初婚进入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高等教育对初婚风险的影响还表现出了明显的队列异质性,如模型(12)至模型(15)所示。分出生队列的初婚风险异质性结果显示随着人口出生队列的推移,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学历层次对初婚风险的显著正向影响在减弱,而研究生学历层次的婚配优势却在显著增加。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变化和高等教育不断扩招,大学生就业受到严重冲击,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在降低,<sup>[56]</sup>导致大学生在婚姻市场中的社会经济相对优势有所减弱。同样面对日益上升的社会经济压力和结婚成本,研究生学历层次不断增加的婚配优势逐渐显现。

在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当前中国的婚姻行为模式是多样化的。高学历在婚姻市场中仍处于优势地位,但不同类型人群身处不同的婚姻市场情境,其婚姻行为都受到中国特有文化属性、社会经济条件、教育发展扩张以及劳动就业市场状况等复杂因素的具体影响。

## 五、结论与讨论

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在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为劳动就业与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中国的婚姻市场。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越来越成为建立婚姻关系的重要基础。当前普遍存在的初婚推迟现象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造成了持续挑战,需要重新审视教育与婚姻之间的关系,为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境下的人口婚姻行为转变提供有力新证据。本研究基于CGSS2010—2021年5次调查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从“毕业-初婚间隔”视角实证分析了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首先,在剔除了上学带来的自然推迟效应之后,高等教育显著正向影响初婚风险,毕业-初婚间隔明显更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在完成学业进入婚姻市场后初婚的发生概率显著更高。这一研究发现与Oppenheimer、於嘉和谢宇、刘伯凡和刘叶的研究结果相符。<sup>[27][32][34]</sup>高等教育的“禁闭效应”最终会转化为婚配市场中的社会经济优势效应、年龄追赶效应和同群社交效应,促进年轻人更快进入婚姻。在当前中国传统婚姻文化的长久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压力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境下,高等教育愈发凸出的婚配优势会逐渐抵消甚至扭转上学对初婚造成的自然推迟,单纯从初婚年龄角度推测教育与婚姻的关系无法估计出高等教育对初婚推迟形成的净影响。



其次,高等教育对初婚进入的显著正向影响在不同性别、队列以及教育层次人群中存在异质性影响。专科与本科学历初婚优势效应差距较小,研究生学历相对于前两者具有明显的婚配优势。相对于女性,高等教育对男性的初婚优势主要体现在专科和本科两个学历层次,但在研究生学历层次出现逆转。这与宋健和范文婷、杨克文和李光勤、卿石松的研究结论相符,<sup>[10][15][55]</sup>可能是不同性别和学历层次人群间社会经济条件、婚姻观念和生活成本等差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另外,需要予以关注的是:随着人口出生队列的推移,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层次对初婚风险的显著正向影响在减弱,研究生学历层次对初婚风险的显著正向影响增加。当前中国教育扩张与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专科和大学教育层次的婚配优势一定程度被削弱。然而,在经济发展和变迁过程中,性别差异化婚姻期待与女性向上婚等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影响深刻而长远,社会经济压力和结婚成本不断增加,更加凸显出高等教育优势效应对于结婚的重要性。

最后,教育发展使真正进入婚姻市场的人口队列年龄整体发生延后,需要以发展的现代视角客观看待当前中国较为普遍的初婚推迟现象,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形成实际初婚年龄推迟的必然规律。<sup>[34]</sup>可以在生理特性的基础上,根据人口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重新定义“适婚年龄”和“适婚人口”,从而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从当前初婚年龄推迟的程度和速度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外在约束力逐渐超越上学的自然推迟效应,成为当代中国初婚年龄推迟的主要动因。本研究的结论为解释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的婚姻实践提供了新的实证分析证据,也为促进适龄婚育提供了政策指向。一方面,完善多类型多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全面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健全同劳动力市场需求与结构变动相协调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与就业性别公平;另一方面,急需健全婚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子女普惠抚育配套,降低结婚和生育成本,积极探索房地产发展新制度新模式,加大满足当代年轻人居住需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保障刚性住房需求,大幅度减轻年轻人的社会经济压力,尽快缓解外生社会经济因素及其引致的内生性思想转变对初婚快速推迟的影响。

本研究立足婚龄群体进入婚姻市场的实际生命历程,从毕业-初婚间隔这一独特视角重新审视了高等教育与初婚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了高等教育在当代婚姻与家庭建构中愈发重要的优势效应。本研究的发现打破了学术研究对教育与婚姻关系的惯常认知,真实反映了当今中国婚姻市场的普遍现象和变动趋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变迁对婚育行为的交织影响,为解释中国社会经济语境下的婚配行为和婚姻市场状况提供了有力新证据,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还期待更多的学者作出理论阐释和经验证据上的补充。后续的研究需要从历史、现实与发展多视角讨论教育发展对婚姻推迟间的关系,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更多关注人们面临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婚育行为和观念的实际影响。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应深入反思西方经典人口和经济理论对于中国婚姻和家庭的适用性,构建符合中国底层逻辑的本土化知识体系,刻画并解释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婚姻推迟现象、特征与趋势,以中国优势的独特智慧去观察和解决婚育行为转变重大议题。

####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8.  
[2] 叶松庆,王良欢. 青年婚恋压力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J]. 中国青年研究,2014(10):18-23.



- [ 3 ] 石人炳,王俊. 中国婚育文化的变迁及其人口学影响[J]. 人口研究,2023(6):78-90.
- [ 4 ] Bongaarts J. The End of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the Developed World[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2, 161:419-443.
- [ 5 ] 李月,张许颖. 婚姻推迟、婚内生育率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对总和生育率分解的研究[J]. 人口学刊,2021(4):1-11.
- [ 6 ] 张现苓,盛亦男.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J]. 人口研究,2023(5):88-101.
- [ 7 ] Becker G S. A Theory of Marriage:Part I[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 81(4):813-846.
- [ 8 ] Thornton A, Axinn W G, Teachman J D.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Enrollment and Accumulation on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in Early Adulthood[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60(5):762-774.
- [ 9 ] 於嘉,谢宇.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J]. 人口研究,2019(5):3-16.
- [ 10 ] 宋健,范文婷. 高等教育对青年初婚的影响及性别差异[J]. 青年研究,2017(1):1-8, 94.
- [ 11 ] 吴要武,刘倩. 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剩女?剩男?[J]. 经济学(季刊),2015(1):5-30.
- [ 12 ] Black S E, Devereux P J, Salvanes K G. Staying in the Classroom and Out of the Maternity Ward?The Effect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Laws on Teenage Births[J]. Economic Journal, 2008, 118(530):1025-1054.
- [ 13 ] 刘爽,高华. 我国人口初婚风险影响因素及其变迁:基于CGSS2010的研究[J]. 南方人口,2015(1):1-14, 46.
- [ 14 ] 陈滔. 高等教育对婚育行为影响的历时演变:兼论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2024(2):51-65.
- [ 15 ] 杨克文,李光勤. 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J]. 人口学刊,2018(6):5-19.
- [ 16 ] 朱州,赵国昌. 上大学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基于IV-Tobit模型的估计[J]. 人口学刊,2019(2):5-16.
- [ 17 ] Monstad K, Carol P, Salvanes K G.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10(4):827-852.
- [ 18 ] 陆杰华. 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综合应对[J]. 人民论坛,2022(8):41-43.
- [ 19 ] 杨振宇,张程. 教育深化对初婚年龄、生育数量的影响:基于义务教育法实施的准试验研究[J]. 人口与发展,2018(1):18-32, 42.
- [ 20 ] Parsons T.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amily[C]//Anshen R N. T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 Harper: New York, 1949:173-201.
- [ 21 ] Becker G.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30-79.
- [ 22 ] 贺光烨,葛霆,于皓. 趋同还是趋异:教育对两性初婚时间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J]. 社会发展研究,2023(3):39-61, 243.
- [ 23 ] Raymo J M, Xie Yu. Tempor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 in the Strength of Educational Homogam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65(5):773-781.
- [ 24 ] 王立军,王玥,胡耀岭. 中国教育获得性别差异逆转下婚姻有效供给匹配失衡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22(3):31-45, 126-127.
- [ 25 ] 杨华. 婚姻挤出: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婚配困难问题解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3):53-62.
- [ 26 ] Oppenheimer V K. 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3):563-591.
- [ 27 ] Oppenheimer V K. Women's Employment and the Gain to Marriage: The Specialization and Trading Model[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7, 23(1):431-453.
- [ 28 ] Blossfeld H P, Rose A D, Hoem J, et al.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Risk of Marriage Disruption in Sweden, West Germany, and Italy[J]. Gender & Famil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1995(2):200-222.



- [29] Ono H. Women's Economic Standing, Marriage Timing, and Cross-National Contexts of Gender[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3, 65(2): 275-286.
- [30] 王宙翔,刘成奎. 人力资本代际传递: 父母教育与儿童健康[J]. *人口与发展*, 2021(5): 58-71.
- [31] 李安琪.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学业表现[J]. *社会*, 2022(2): 209-242.
- [32] 於嘉,谢宇. 社会变迁与初婚影响因素的变化[J]. *社会学研究*, 2013(4): 1-25, 242.
- [33] 於嘉,赵晓航,谢宇. 当代中国婚姻的形成与解体: 趋势与国际比较[J]. *人口研究*, 2020(5): 3-18.
- [34] 刘伯凡,刘叶. 高等教育的婚姻效应: 推迟结婚还是选择不婚?——来自合成控制法的新证据[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8(3): 93-109.
- [35] Sweeney M M. Two Decades of Family Change: The Shifting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rriag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2, 67(1): 132-147.
- [36] Raymo J M.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Transition to First Marriage among Japanese Women[J]. *Demography*, 2003, 40(1): 83-103.
- [37] 陆杰华,冯雨欣. 青年发展视角下新时代青年人口的性别差异探究[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4(1): 23-33.
- [38] 李光勤,冯亚芳,公衍磊. 城市规模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 来自 CLDS2016 的经验分析[J]. *人口学刊*, 2021(5): 1-15.
- [39] 张亮,杭斌. 教育与主观社会地位: 基于地位寻求理论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8(8): 85-93.
- [40] 张抗私,史策. 高等教育、个人能力与就业质量[J]. *中国人口科学*, 2020(4): 98-112, 128.
- [41] 翟振武,刘雯莉. 中国人真的都不结婚了吗: 从队列的视角看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J]. *探索与争鸣*, 2020(2): 122-130, 160.
- [42] 杨菊华. 中国真的已陷入生育危机了吗?[J]. *人口研究*, 2015(6): 44-61.
- [43] 邱婕. “三十”而立?——适婚年龄女性的生命历程制度化与时间压缩[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6): 59-67.
- [44] 朱安新,风笑天. “90后”大学生异性交往观念: 以婚前性行为接受度为分析重点[J]. *青年探索*, 2016(2): 68-73.
- [45] 刘昊. 择偶方式会影响婚前同居吗?——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人口研究*, 2019(6): 49-63.
- [46] Marini M M. Determinants of the Timing of Adult Role Entry[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85, 14(4): 309-350.
- [47] Liefbroer A C, Billari F C. Bringing Norms Back in: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Discussion of Their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Demographic Behaviour[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0, 16(4): 287-305.
- [48] Spéder Z, Bartus T. Educational Enrolment, Double-Status Posi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therhood in Hungary[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17, 33(1): 1-31.
- [49] 王乐,张乐. 为什么上大学: 乡村学生“离土”选择的教育发生考察[J]. *教育研究*, 2021(11): 107-118.
- [50] 石磊.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J]. *人口研究*, 2019(6): 90-104.
- [51] Klein J P, Moeschberger M L. *Survival Analysis: Techniques for Censored and Truncated Data* [M]. New York: Springer, 2003: 45-49.
- [52] 刘汶蓉. 家庭现代化道路上的女性发展困境与政策出路[J]. *妇女研究论丛*, 2023(1): 11-21.
- [53] 张文宏,刘琳. 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种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J]. *社会学研究*, 2013(5): 53-75, 243.
- [54] 侯娟,郑心怡,王秀,等. 金钱与时间感受启动对择偶标准的影响[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1(6): 838-844.
- [55] 卿石松. 女性教育提升与生育行为变迁: 基于夫妻匹配视角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24(2): 179-202, 230.
- [56] 李晓光,陆瑶,吴晓刚. 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失配[J]. *教育研究*, 2023(6): 122-137.

[责任编辑 王晓璐]

##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First Marriage

—New Evidence from CGSS 2010–2021 Data

LU Jiehua<sup>1,2</sup>, SUN Yang<sup>2</sup>

(1.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marriage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the widespread delay of first marriage poses a continuous challenge to the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in China.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postponement of first marriage age, such as ignoring the objectiv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e difficulty of endogenous measurement model, the inability to explain the actu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the marriage market, unable to provide stro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marriage matching mechanism in modern society, nor objectively reflec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marriage market in China, and th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marriage needs to be re-examined. Based on CGSS 2010–2021 data, this paper further takes the highest graduation time as the observation point, and explores the net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 other than the natural delay of first marriage brought by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dimension of the interval from graduation to first marriage by using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excluding the natural delay of schooling, higher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the risk of first marriage and shortened the interval from graduation to first marriage. This result still held true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lockdown effect" of school will eventually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socioeconomic advantage effect, the age catch-up effect and the same group social effect in the marriage market, which to some extent promotes young people to enter marriage faster. Compared with junior college and undergraduate graduates, people who graduate degree have more obvious advantages in entering marriage. Compared with women, the advantage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men in entering marriage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evel of junior college and undergraduate degree, but it is reversed in the level of graduate education. With the passage of birth cohort, the marriage advantage of junior college and undergraduate degree level is weakened, while the marriage advantage of graduate degree level is enhanced. Under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rriage culture, the advantages of high education in marriage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gradually offset and even reverse the natural delay caused by schooling. The external binding force of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gradually surpasses the natural delay effect, becoming the main motivation for the delay of the first marriage 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e the inability to estimate the net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first marriage pur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tual age of first marriage, and provide a strong new evidence and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marriage behavior and marriage market situation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 of China.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First Marriage, Marriage Market, Survival Analysis